

從圖像看日本對甲午戰爭的宣傳

鍾淑惠*

關於中日甲午戰爭有諸多討論，對於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大多抱持著不堪一擊的想法，但若是進一步了解當時中國的軍事狀況、分析中國的內在局勢，便可發現，其實並非如一般所論述的，中日實力相差懸殊。但何以中國大敗？同時在日後論及甲午戰爭時，均一面倒向日本，媒體宣傳，實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本文主要從圖像著手，探討日本在甲午戰爭期間，如何運用圖像達到宣傳的目的，尤其藉由浮世繪的繪製，塑造中國與日本的形象，大量的圖像傳播，深入人心，從而將其侵略中國的私心，包裝成落後與文明之戰，將之合理化。而中日對待媒體宣傳的態度，影響著國際觀感與輿論，對於戰爭的進行，實有著相當的影響。文中以當代日本與西方的文字資料與圖像相互對照，呈現當代日本的真實樣貌與日本形塑後的形象，探討當代日本繪製的圖像與媒體宣傳，及其在甲午戰爭中的影響。

關鍵詞：圖像、媒體宣傳、日本漫畫、浮世繪、甲午戰爭

*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聯絡方式：71005臺南市永康區南臺街1號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No. 1, Nantai St., Yongkang Dist., Tainan City 71005, Taiwan [R.O.C.])。

一、前言

1894年9月17日，日本藉口朝鮮問題，派遣聯合艦隊，大舉駛入黃海海域，在鴨綠江出海口大東溝附近與北洋艦隊遭遇後，發動攻擊，揭開黃海海戰的序幕。當時清軍鐵甲艦隊成軍已有相當時間，在西洋教習訓練之下，不僅船隻噸位不下日本，也頗能發揮訓練成效，迅速反擊，迫使日艦後退。但日艦購自英國，轉動靈活，可以迅速轉向，繞道北洋海軍右側，發揮火炮威力，重創北洋艦隊，旗艦也遭擊中，清軍傷亡人數頗多。此次海戰，歷經5小時，北洋艦隊損失巡洋艦五艘，受創四艘；日艦則受損五艘。自此以後，日本掌握了東亞海域的控制權，成為重要海權國家。隨後的陸戰中，中國陸軍也遭到嚴重打擊，新建的陸軍似乎不堪一擊，日本能夠節節進攻，此種情況，宛如秦漢時期，異族可以輕易突破中國邊塞，而漢家健兒則一籌莫展。中國希望保存實力，決議求和，遂於甲午戰爭之後，會於日本馬關，簽訂馬關條約，不僅決定了臺灣割讓的命運，也影響了近代中國的發展。

此後的一百多年間，中國歷史教育一直以喪師、喪權為奇恥大辱，儘管時代不同，歷史教育一直都將甲午戰爭描繪成亡國的開端。梁啟超(1873-1929)先在《戊戌政變記》中說：「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¹當此之時，知識份子與仕紳階級逐漸體認，「自強運動」不足以御侮，船堅炮利不足以救國。在京準備參加廷試的舉子紛紛上書，要求清廷變法圖強，康有為(1858-1927)便上書曰：

伏乞皇上近法列聖，遠法禹、湯，時下明詔，責躬罪己，深痛切至，激厲天下，同雪國恥。使忠臣義士讀之而流涕憤發，驕將懦卒讀之而感愧忸怩，士氣聳動，慷慨效死。人懷怒心，如報私仇。然後皇上用其方新之氣，奔走馳驅，可使赴湯蹈火，而豈有聞風嘩潰者哉？此列聖善用其民之成效也，故罪己之詔宜下也。²

¹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59)，頁1。

² 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見：<http://zh.wikisource.org/wiki/上清帝第二書> (2015/02/14)

以孫中山(1866-1925)為首的革命派人士，雖然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已經決意要傾覆清廷，創建民國，³但甲午戰敗之後，因為原本主張立憲的國人逐漸同情革命，才能更積極的推動建立共和的行動。

這種歷史形象與史觀深植人心之後，逐漸形成中國的民族意識，認定中國自始即無法與時俱進，甚至將「歐洲病夫」的概念移植到中國，自嘲為「東亞病夫」。⁴這樣的民族主義史觀自然無法說明甲午戰前中日兩國的狀況，也徹底否定清朝後期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努力，更無法讓國人了解自強運動的成果及國家發展的進程，自強運動並不如此膚淺，船堅砲利政策也不盡然毫無成效。

二、甲午戰爭與媒體宣傳

甲午戰爭，雖是中日兩國近代歷史發展的重要分水嶺，但此次戰役，迅速結束，未必能夠真正顯示國力強弱。甲午戰前，歐美各國甚至不認為日本可以戰勝中國，各國估計，也自有其依據。但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後，傾全國之力，不斷宣揚日本的進步與崛起，把中國描繪成反面教材，不僅落後、顛覆，甚且毫無軍紀。許多國人竟也接受這種宣傳，也把中國想像成風中殘燭。有大炮炮身晾曬衣物、官兵聚賭等的指責。民國肇建以後，新建的共和政府又不斷加強其「清廷腐敗」的宣傳，以合理化革命行動。自此，大清帝國腐朽不堪的形象深植人心。

反觀鄰國日本，1860年以前，仍處於極為封閉的狀態，從美國黑船打破日本的鎖國政策，與之簽訂神奈川條約之後，各國海船紛至沓來，日本

檢閱)。

³ 《建國方略：心理建設》第8章〈有志竟成〉中寫道：「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孫文學說》(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1951)，頁156。

⁴ 「歐洲病夫」一詞原為19世紀中期以後俄國皇帝稱奧圖曼帝國的說法。「亞洲病夫」一詞最早見於1896年的〈字林西報〉，將中國比喻為病人，需要各種藥方，原本並無貶抑之意，但梁啟超等人卻不斷擴大解釋這個語詞，「東亞病夫」的說法不斷在中國流傳、散佈。

與外國人的衝突也不斷，生麥村事件便是一例。⁵日本也就因為生麥村事件，痛下決心西化，學習西方科學技術與法律制度，迅速脫胎換骨。

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曾有幾次對外軍事活動的經驗，尤以牡丹社事件以後的出兵臺灣為主，但當時日本維新的成果尚未顯現，軍事行動也未能完成，甚至許多戰士死於疾病，雖不是鐵羽而歸，也不足以打動民心。中日甲午戰爭可說是日本明治維新成果的第一次驗收，自然引起日本全國上下的注意，欣欣向榮的媒體自然要掌握這個絕佳機會，有關甲午戰爭的圖像與報導，乃充斥全國，成為日本政府宣傳國威的最佳利器。這些圖像與文字，不僅影響日本國內的讀者，許多圖片也幾經轉譯，傳播各地，中國留學生也在日本或經由日本媒體，「認識」中日甲午戰爭的經過，甚至據此為底稿，向國內輸入，儘管許多內容荒誕不經，卻先入為主，製造錯誤印象。這些圖像傳達的意念，則一直停留在後人腦海中。

歷史研究的資料來源甚多，研究史前史者，多需依賴器物，信史發展，文本與文物並重。近代以後的歷史研究，則因主題不同，可以使用各種不同的資料、器物或圖像。透過文本，可以理解作者的想法與思路，透過圖像，則可對生活相貌與器物的型態有較清楚的認識。過去幾十年來，傳播理論與視覺藝術的理論越來越發達，對許多事務的解釋，有其獨到之處，可以提供歷史研究者另一角度的觀察與認識，若輔以心理分析或社會理論，更讓讀者清楚認識形象以外的意涵，⁶得以透過影像，理解事務的另一種「本體」。讀者往往透過其所觀看的圖像，「製造」想像和記憶，甚至強化歷史記憶，改變歷史知識傳播的方式。⁷

作者蒐集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日本媒體傳播之不同影像，輔以歷史事實，希望另闢蹊徑，在傳統中日甲午之戰的軍事發展，政治與外交角力之

⁵ 1862年，江戶幕府末期殺傷外國人事件。島津久光從江戶回藩，途經橫濱附近的生麥村，薩摩藩士以四名英國人騎馬行走，攪亂行列秩序為由，砍死一人，傷二人。英國要求幕府、薩摩藩懲兇和賠償此時正為「攘夷」盛時，肇事者薩摩藩拒絕英國要求。英國派艦隊炮擊鹿兒島，發生薩英戰爭。薩摩藩大敗，轉採開國方針，與英國接近，是為生麥村事件。

⁶ 彼得·伯克著，楊豫譯，《圖像證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9。

⁷ 尼古拉斯·米爾佐夫著，倪偉譯，《視覺文化導論》（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239-240。

外，從影像角度，觀察戰後中日兩國的「國家精神」起伏，嘗試了解，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所謂「時代精神(Zeitgeist)」是如何塑造、如何表現，如何體會。受論文體材與篇幅限制，本文僅能就作者所選之日本畫家繪製作品為例，無法完全討論，雖難免有「管中窺豹」之虞，但仍可作為甲午戰爭的歷史的新視角。

三、甲午戰爭前的中國

許多人對近代中國的刻板印象是守舊、頑固，這種想法與歷史事實完全不符；清代開國之初，便對西方文明有相當認識，不斷積極引進新知，也樂於嘗試新事物。康熙皇帝(1654-1722)不僅喜歡數學，聘用西方教士學習數學，也經常在宮中試用火器，並教導其子孫學習。康熙皇帝也喜歡紅酒，又於 1708 年聘僱耶穌會教士，編繪皇輿全覽圖，描繪從庫頁島至臺灣，從伊犁河，北海(貝加爾湖)至崖州(今海南島)之地圖。

雍正(1678-1735)繼位，也嘗試各種西方器物，也留下西方畫工為其繪製頭帶卷曲假髮的畫像(圖 1)。乾隆(1711-1799)更是經常與西方教士來往，要宮廷巧匠仿製西方珍貴藝品，也嘗試各種火砲。慈禧(1835-1908)留下許多攝影相片，說明其對新奇物品也相當關切。但甲午戰爭失利之後，這些君王剎時間都成了頑固的守舊派，因此造成了中國的落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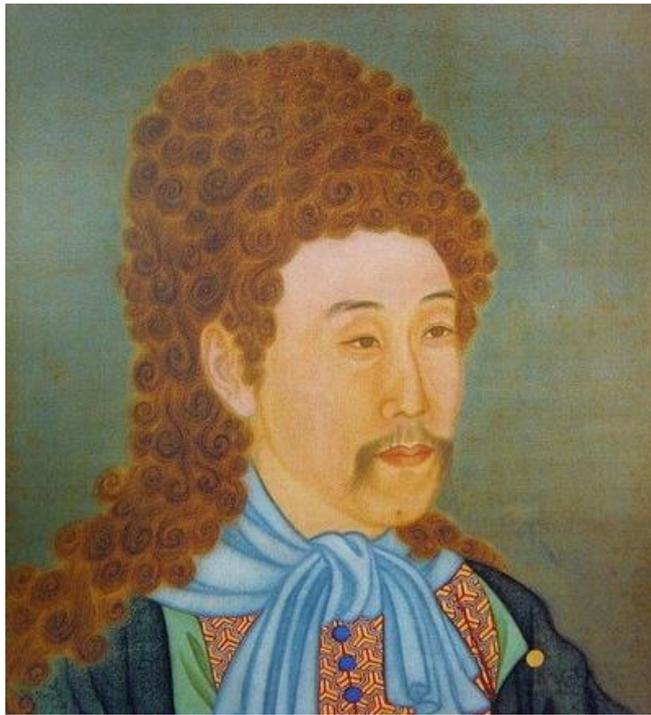


圖1：《雍正卷髮畫像》

資料來源：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lddw/2008-03/27/content_13681799.htm，
2015/2/14檢閱。

不僅皇室喜好新鮮事物，一般官吏對西方火器與機械文明也不陌生，太平軍起事期間，湘軍與淮軍同時認識西方軍事技術的效能，也成為日後自強運動的主線。太平軍起事時期，一度計畫進攻上海，當地紳商乃出資招募中國及菲律賓士兵，購買西方武器，由傭兵組成洋槍隊，並委請外國軍官指揮。這支洋槍隊不僅可以保護上海，甚至出擊各地。1862年，清廷將之擴編為「常勝軍」。傭兵隊原本為錢而戰，清廷無力供應糧餉時，隊長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也曾縱兵劫掠。華爾陣亡後，一度由法裔美籍的白齊文(Henry Andres Burgevine, 1836-1865)繼任隊長。白齊文更顯示出傭兵隊特質，甚至因所求不遂，劫掠清兵軍餉。李鴻章(1823-1901)乃將之撤職，改以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任隊長，以對付太平軍。

直到 1864 年太平軍事平後，常勝軍才解散。不僅清軍用洋槍洋砲，太平軍也使用西式武器。蘇松太道吳健彰(1791-1866)就曾經捕獲寧波釣魚船一艘，載有夷人與洋槍六千桿，夷人並攜有書信一封，為英吉利商人與太平軍將領的書信，說明夷人雇裝兵器，打算前往鎮江賣給太平軍。⁸

李鴻章因為剿太平軍之故，曾在上海停留，與英法等國人士磋商防守上海之道，淮軍也曾與英、法軍以及常勝軍協同作戰，所以李對西方軍事技術與領導統御並不陌生。同治元年(1861)，總理衙門曾兩次下令李鴻章「用外國法練中國兵」，李鴻章乃積極籌洋務，購置洋槍洋炮，並聘請洋人訓練淮軍，並於同治六年(1867)擴充製造槍炮和修造輪船的江南機器製造局，將廠房由虹口遷高昌廟，成為清政府最大軍事工業，另外設立翻譯館，翻譯克虜伯(Krupp)炮學書籍，由金楷理(Carl T Kreyer, 1839-1914)口譯，李鳳苞(1834-1887)筆述，翻譯刊刻各種新式武器的操典，如《克虜伯炮圖說》、《克虜伯炮操法》等書。淮軍購買德國槍砲之後，克虜伯兵工廠還協調派出德國軍事教官李勳協(C. Lehmeier)等人來華擔任教習。當李勳協任滿回國之時，李鴻章也接受其建議，挑選年輕軍官赴德學習。

從同治二年(1863)開始，李鴻章便令淮軍各營聘請西洋軍事專家擔任教練，教導淮軍操作之法。淮軍乃由程學啟(1829-1864)和劉銘傳(1836-1896)所部炮隊組建炮兵，又接管常勝軍的炮隊 600 人，一共有炮隊四營，均裝備先進武器。淮軍也仿效西方制度，增設工程兵，擔任搬運等工作。此後，淮軍的設備步步向德國看齊，到光緒三年(1877)時，淮軍一共組建新式炮隊 19 營，裝備德國克虜伯後門鋼炮 114 尊，裝備也不斷更新，洋槍改為後膛裝填；洋炮則由前膛短炸炮更新為長炸炮、後膛鋼炮。

海軍方面，李鴻章也相當注意，1878 年 6 月，李以李鳳苞擔任出使德國大臣，負有洽談購買海軍軍艦的任務。李鳳苞提出各種建議後，李鴻章以鐵甲船為優先，並派技術專家徐建寅(1845-1901)到德國考察兵工廠，並決定購買德國伏爾鏗造船廠的新式鐵甲艦兩艘，即為日後之「定遠」、「鎮遠」二艦。光緒九年(1883)，李鳳苞另向德國訂造巡洋艦「濟遠」號。光緒十一

⁸ 見李鴻章，《復陳奉旨督軍河洛折》，收入吳汝倫編，《李文忠公全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奏稿第9卷，頁56。

年(1885)，「定遠」等艦完工，返國服役。

李鴻章對西方軍事的注意，雖是出於形勢所迫，但十幾年功夫並未白費，淮軍建軍的成效已經有目共睹，就連曾國藩也覺得有學習的必要，商請淮軍協助湘軍換裝。以 1870 年前後的情況看來，中國新式軍事裝備並不遜於其他西方列強，且遠遠超過當時的日本。此所以中國辦理自強新政時，多限於軍事與工業建設，對其他方面並未多著墨。

但此時中國內政情況並非太平無事，先是嘉慶元年(1796)四川地區發生白蓮教信眾起事，蔓延到湖北、河南、陝西各省，此次教亂歷時數年，花費軍費大約五億兩白銀，約為數年的國庫收入，而八旗與綠營的腐朽無用，亦暴露無遺。此後，各種動亂紛至沓來，太平軍之役(1851-1872)、捻亂(1853-1868)與新疆回變(1862-1873)等，中國經常處於戰亂之中，儘管新式武器是為了國防之用，但實際上用於弭平內部亂事，也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戰爭效果，西方社會雖了解中國軍事設備，但對其訓練與組織，並未予以好評。

四、近代西方媒體觀察中國

中國原本雖有各種邸抄等類似新聞報紙的傳單，但影響僅及於士大夫階級，並未能深入民間。近代報業的發達，還是由西方商人與傳教士奠定基礎。英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在馬六甲發行第一份中文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⁹類似月刊，以介紹西方科學新知與法律社會為主，算是中文報業的先驅。

1827 年，蘇格蘭商人詹姆士·馬地臣爵士(Sir James Matheson, 1st Baronet, 1796-1878)與美國商人伍德(William Whiteman Wood, 1804-?)曾一起創辦《廣東紀錄報》(*The Canton Register*)，兩週發行一次，報導商業行情，甚至鴉片價

⁹ 馬禮遜原籍蘇格蘭，早年加入「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蘇格蘭傳教士。1807年，受傳道會派遣到廣州傳教。來華之前，先學習中文、天文及醫學知識，希望以傳授西方科技的方式傳教。1807年抵達澳門，學習中文，並開始翻譯《使徒行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等宗教經典，秘密出版。1815年馬禮遜在也講述基督教義。每期印行5至7頁，約2000字，以木刻雕版，竹紙印刷，呈線裝書本形式。不過這份雜誌並非發行於中國境內，對中國讀者的影響相當有限。

格。1839年，中英因鴉片問題發生衝突，馬地臣等乃將該報遷往澳門，改為《澳門雜錄》。1843年，該報再遷香港，改名《香港紀錄報》，算是中國境內第一份英文報紙。

1850年8月，英國商人奚安門(Henry Shearman, ?-1856)在上海創辦《北華捷報》，算是當時影響較大的報紙，這份報紙初為每周六出版一次，以報導長江流域及以北(北華)的消息為主，內容包括英國快訊、英僑動態、商務情報、廣告及船期公告等。1856年，又增加日刊《每日航運新聞》(*Daily Shipping News*)，後改為《每日航運和商業新聞》(*Daily Shipping and Commercial News*)又稱《航務商業報》。1864年6月《北華捷報》的副刊《船務商業日報》改為《字林西報》，《北華捷報》周報則改為副刊，著重於時事與政治的討論，隨《字林西報》發送讀者。¹⁰

1868年，上海的美籍傳教士林樂知(Lin Lezhi, 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等人出版《教會新報》(*Church News*)，1874年改稱《萬國公報》，屬周刊性質，主題包括時論與新知。到1883年，萬國公報經費不足，被迫停刊。英美基督教傳教士乃聯合組織廣學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於1889年恢復《萬國公報》，內容包括政治、時事，也介紹「西學」，影響深遠。¹¹

清末以來，各種報刊成為傳播新知、表達對時政看法的重要工具，這些媒體對中國事務相當關心，經常有各種報導，但多處於一種較為批評的立場，甚至成為知識份子的傳聲筒。「東亞病夫」一詞的發展，足以說明當時報紙的立場。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字林西報》於1896年10月17日發表文章，批評中國官僚腐敗、官場風氣惡劣，此後，西方世界經常稱中國為「病夫」。傳教士李佳白隨後於《萬國公報》發表〈探本窮源論〉，將中國比喻成病人，作者以醫師角度，開立藥方，有系統地提出對清政府如何澄清吏治、改善財政、發展教育的建議。

19世紀末期，電報的應用已經相當普及，各國新聞媒體在中國都設有

¹⁰ 《字林西報》一直發行到1951年才停刊，歷史長達百年。

¹¹ 1896年，維新運動前後，該刊發行量接近4萬份，1903年，發行量高達5萬多份。

專門採訪人員，所有消息均瞬息可達。電報原本必須使用電線傳送，最早期並無海底電纜，無法跨越海洋。1850年，英國與歐陸之間首先架設海底電纜連接，1866年，歐洲與美洲間的海底電纜才能商業運轉，但橫越太平洋的海底電纜要到1902年才完成架設工作。

中國的第一條電報線路出現於1871年，1877年10月臺灣也有了電報設備。1879年，李鴻章也在天津與大沽及北塘之間架設軍用通信電報。到1880年，李鴻章奉准開辦電報總局，從此，中國的電信事業發展迅速，1881年底，天津到上海的電報已經可以傳達及時信息。中法衝突之際，國人充分認識電報的用途，因此更加積極建設電報系統。1887年，劉銘傳架設中國首條海底電纜，連接福州與臺灣。

五、戰爭期間中日兩國政府對媒體的態度

甲午戰爭之際，媒體已經相當發達，不僅各國在東亞地區派駐記者，電纜電線，千里消息，須臾可至。大城市之中，亦有各種文字報紙，各國媒體對中日大事，知之甚詳。透過媒體向國際社會陳述立場成為作戰國主張戰爭合法性和為戰爭行為合理化的重要工具，即便不能求得列強為己之助，至少可以要求列強中立，或不為負面報導。如何利用媒體宣傳，表達自身立場，恆為今日當國者處理之要務，但大清王朝上下並無此等體認。中日兩國對待媒體的態度，與戰爭的結果有極為密切的關係，首先，我們應當檢討大清對待媒體宣傳的態度及影響。

清末以來，政府對國際輿論一向不予重視，對各種涉外事件，也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視之。甲午戰事進行之際，不僅拒絕外國記者隨軍採訪，也拒絕外國武官隨軍觀戰，根本不與各國對話，說明事件來龍去脈。但這種消極態度，並不能影響列強對戰事的關心。

日本在近代化過程中，相當注意傳播與媒體，各方都利用西方已經相當發達的平面媒體作為宣傳推廣維新運動的工具。因為許多印刷品流通於各地，市場秩序相當混亂。此時，日本各大城市之中均有許多通俗小報出刊，因為文字簡單，版面活潑，常附上精美插圖，又有假名注音，頗受平

民大眾歡迎。日本政府乃率先於 1869 年頒佈《報紙印行條例》，規範平面媒體的運作與發行。日本首家日報《橫濱每日新聞》則在 1871 年初問世，一年之後，《東京日日新聞》也在政府支持下發刊。

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頗多得益於它在媒體宣傳的做法。日本對朝鮮進行戰略包圍時，聘請美國《紐約論壇報》的記者豪斯(Edward Howard House, 1836-1901)作為國家宣傳戰的總指揮。豪斯很熟悉西方媒體的運作方式，在他的包裝下，西方媒體對中國與日本分別代表著野蠻與文明的認識，形成了一種潮流與共識。¹²

同時，很多日本外交官自己還寫東西，像美國公使栗野慎一郎(1851-1937)，專門組織在美日本外交人員和學者積極寫稿，試圖影響美國輿論，效果顯著。

戰爭開始之前，日本已經啟動宣傳機器，不僅允許外國武官觀戰，外國新聞記者隨軍採訪，也同意日本各報刊記者、畫師、照相師，乃至僧侶等人隨軍，或採訪、或撫慰士兵。日本既然視此次戰役為日本「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環節，自然飭令其軍隊遵守西方社會的相關規範，從服裝儀容到攻城掠地，都必須符合國際慣例。

當時清政府不重視新聞報導、國際宣傳，對許多細節也不注意，保持其一貫保守的態度，國際社會因此僅能根據自己的觀察或日本的片面之詞。

儘管歐美各國也在戰爭期間派出大批記者與攝影記者前往各地戰場，隨軍觀察戰事經過，但仍有許多觀察不到之處，因此西方各國雖然對戰爭經過並不陌生，卻相當依賴日本報導。從當時留下的許多文獻與報導觀察，當時西方媒體普遍傾向日本，認為日本的行動不僅必要且正當。許多扭曲的報導，要過了相當時日，才能澄清。

我們可以用高陞號(Kowshing)事件為例，說明日本對媒體的處理方針。高陞號為英國商船，受雇於中國，運送一千多名士兵，途中與日本軍艦相遇，遭其擊沉。日本一方面隱瞞高陞號為英籍之事實，命其駐英公使青木周藏(1844-1914)私下向英方表示同意賠償，又收買英、德兩國報紙為日本辯

¹² 萬國報館編著，《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體觀察》(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頁315-316。

護，英方甚至接受日本隊高陞號的攻擊完全出於需要、毫無錯誤的說法。可見日本對戰爭的宣傳相當成功，而中國一直處於挨打的局面。

六、國際媒體對中國的負面評價

兩種不同的價值觀衝突之際，難免互相指責，而近代中國與西方列強交涉過程中，西方人對中國的基本觀感多為「不文明」。1860年英、法兩國要求修約的過程中，清政府以怡親王載垣(1816-1861)、兵部尚書穆蔭(?-1864)到通州南張家灣議和。雙方爭執不下之際，清廷擄走英國談判代表巴夏禮(Sir Harry Smith Parkes, 1828-1885)及士兵等39人，引起極大爭議。中外不斷發生的教案爭議中，往往可見中國群眾殘忍血腥之作法，引發英法聯軍的馬賴教案，即為明證。

甲午戰爭時，中國各地公佈懸賞佈告，鼓勵清兵殺敵，取敵頭顱邀賞。¹³延續一貫對待俘虜的態度，懸賞拿首級，不符合當時的國際規範。

根據日本陸海軍內部戰報記載：在旅順附近土城子戰鬥中，日軍偵察小隊11名士兵拒絕投降，自殺身亡。清軍有破壞屍體之舉。一名中尉的頭顱和身體分離，兩腕被切斷。其餘士卒服裝、物品均被掠奪。屍體也發現多處毀壞，身首異處，鞋子也遭剝走，赤裸雙足。屍體則棄於路邊。¹⁴日本於2月13日新聞報道：「清軍在距芝罘南六十清(華)里處，俘獲日本前哨騎兵23名，有電報請示如何處理，巡撫李秉衡下令一律就地梟首。」¹⁵

日本攝影師龜井茲明(1861-1896)隨同第二軍，前往旅順，他記述日兵陣亡現場：

¹³ 朝鮮平壤會戰，清軍葉志超軍和左寶貴軍丟棄的懸賞狀：「奪獲洋槍一桿者，賞銀12兩；槍斃倭賊一名割取首級者，賞銀30兩；生擒倭賊者，賞銀60兩。」江南機器造局懸賞佈告：「捕獲日本間諜100兩，捕獲通敵清人間諜者50兩，密告日本間諜居所者40兩，密告通敵清人間諜居所者20兩；捕獲日本軍艦一艘者10,000兩，破壞日本軍艦一艘者8,000兩，捕獲日本商船一艘者，5,000兩，取敵兵首級一枚者50兩。」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頁438。

¹⁴ 轉引自宗澤亞，《清日戰爭》(香港：商務印書館，2012)，頁229。

¹⁵ 旅順清軍曾下達過「不准割取首級割首級者不賞，以防耽延時刻有誤行軍」的命令，但拱衛隊士兵不顧軍規而割下中萬德次中尉以外的11顆首級。龜井茲明著，高永學等譯，《血證——甲午戰爭親歷記》(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頁187。

我十數名戰死者的首級，悉數被敵兵奪走。大多數砍斷左手，割去陰莖：有削掉鼻子、剝出眼球者，剖開的腹內有碎石。一騎兵喇吧卒，四肢和頭顱被砍斷，腹內入石塊，陰莖割斷，睪丸亦被取出。徐家窰一民家院內的玉米秸下，一名身著我兵服布片的兵士，被斬斷右臂、腹部橫斷，睪丸剝除，陰莖的龜頭割掉...其殘忍酷薄之狀，令人皆裂扼腕、悲憤填膺。我兵見者、聞者無不義憤激昂，對清兵復仇氣焰盛上。¹⁶

清軍沿用一向對俘虜處刑的方式，並未能讓日本更珍惜人權，反而成為日本軍隊在旅順屠城、殘殺中國軍民的藉口。但日本仍不斷以中國未能以國際人道精神對待戰俘做文章，指責中國不符國際規範，將中國塑造成野蠻落後的民族，更可以強化其所宣稱的中日之戰為「落後與文明」的戰爭。

七、日本媒體對中國的負面宣傳

日本文化原本落後於朝鮮半島，唐代以前，自朝鮮半島認識中國文化，於唐代大量派遣學生與學問僧進入中國，開始一連串的華化運動。自此，其語言、文化、思想乃至生活方式都受中國影響。17世紀起，日本開始鎖國。期間，其海盜集團雖不斷騷擾中國沿海各省，但與外界接觸，終屬有限。直到19世紀中，美國海軍叩關，強迫通商，日本才放棄鎖國，但當時日本情況，與中國相當接近。但明治天皇(1852-1912)繼位，眼見中國在列強環伺下，從泱泱大國到淪落到如此不堪，心中不能無所感。而明治天皇發動維新運動之後，進步神速，使原本朝野原本對中國的崇敬蕩然無存。

1862年，日本近代思想家高杉晉作(1839-1867)奉派前往上海等地遊歷，希望蒐集西方列強對中國各種侵略與中國肆應之道的相關情報。他在華期間，適逢太平軍之亂，因此就近觀察中國內部動亂，寫下許多日記，後集結出版為《遊清五錄》。¹⁷書中他對中國的描述已經相當負面，包括土地被英夷所奪、中國人淪為奴隸、中國人居所擁擠、不潔。英、法等國之人大

¹⁶ 龜井茲明著，《血證——甲午戰爭親歷記》，頁161。

¹⁷ 1916年由其孫高杉春太郎整理，交由東京民友社以《東行先生遺文》之名出版。

搖大擺，上海蠻夷遍地。這種「中國印象」不斷在日本人之間口耳相傳，形成新的刻板印象。無論是日本漫畫家小林清親(1847-1915)的〈百撰百笑圖〉或是同時期日本的畫工，都以各種繪畫形式，表現出日本人對中國的理解與想像，可以進一步看出端倪。

小林清親為日本重要的浮世繪畫家，以西方技法為根據，日本浮世繪的精神為出發，繪製許多描述時事的圖片，甚至將許多新鮮的西方事物如馬車、鐘樓等圖像入畫，刊登於媒體與書籍，頗受歡迎。他的系列作品描繪東京近代化過程的變遷，堪稱為其代表作。中日甲午戰爭期間與日俄戰爭期間，小林清親憑藉想像，以「日本萬歲」為主題，繪出許多戰爭場景，並將系列圖片稱為「百撰百笑」(每一幅圖均值一笑)，強調日軍英勇，軍容壯盛，不僅發揮軍魂，甚至成為國際典範。這一系列的套圖，刊登於日本平面媒體，引起很大回應，激發日本的民族意識。其中有關中國圖像的繪製，以下分就幾個主題論述：

(一) 迷信

中國當時的白蓮教、太平天國亂事，多與宗教有關，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圖 2 將日軍做成人偶，吊掛在樹上，人偶脖子向前伸，臉部表情兇狠，但身著合身軍裝、手托長槍、裝備完整，中國人則是對著人偶雙手高舉，面露驚恐狀，中國人的形象，則是寬鬆衣物、綁腿、外加瓜皮帽與薙髮。似是作法，又似是為日軍所震懾。小小的日軍人偶，讓中國人害怕。在此主題中，另有對偶像崇拜與拿香拜拜的圖像，目的在將中國塑造成一個迷信、落後的民族，與現代文明進步是兩個世界，並且畏懼日本，即便是日軍人偶亦足以讓中國人畏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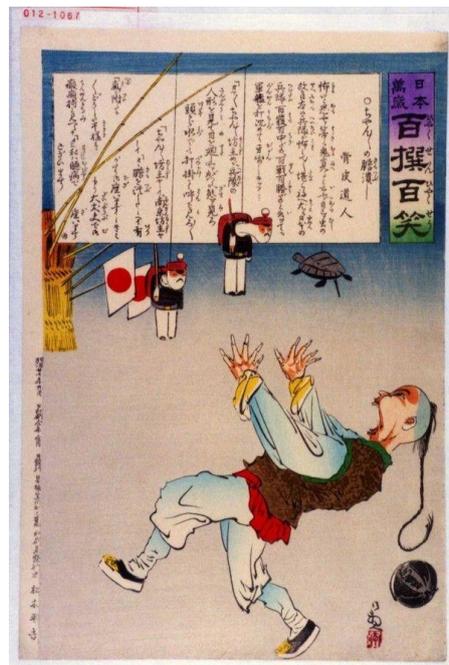


圖2：〈百撰百笑〉

資料來源：

http://big5.china.com/gate/big5/tuku.news.china.com/history/html/2007-05-25/2024162_087232778.htm，「組圖：日本漫畫中的『甲午戰爭』」，老照片圖庫，中華網，2015/2/14 檢閱。

(二) 怯懦

這類的圖像，多半將日軍繪製成形象巨大，而中國相形之下顯得渺小，以物像大小呈現權力威勢。尤其巨大的日軍形象，常常是伴隨著整齊軍裝，採取由上向下俯看的姿勢，顯示日居於上位而中國位居其下，在表現主題的選擇上，嘲弄意味極為濃厚。

圖3，以海戰為主題，畫面中日軍手拉起漁網，海灣中的船隻猶如網中魚，完全受其擺弄，無法逃脫。而繪者也將船隻繪成魚的形狀，極為諷刺。一旁的日軍，盡是玩弄囊中物、輕蔑嘲弄的神情。



圖3：〈百撰百笑〉

資料來源：

http://big5.china.com/gate/big5/tuku.news.china.com/history/html/2007-05-25/2024162_087311898.htm，「組圖：日本漫畫中的『甲午戰爭』」，老照片圖庫，中華網，2015/2/14 檢閱。

圖 4，地面上有中國人偶與船隻玩具，一軍手托長槍大腳踩踏，地面上的人偶與船隻應聲碎裂，而一旁的中國人則似小孩般的掩面嚎淘大哭，而毫無作為。說明當時日人心態，為所欲為，但中國毫無反抗能力。



圖4：〈百撰百笑〉

資料來源：

http://big5.china.com/gate/big5/tuku.news.china.com/history/html/2007-05-25/2024162_087141624.htm#pic，「組圖：日本漫畫中的『甲午戰爭』」，老照片圖庫，中華網，2015/2/14 檢閱。

(三) 粗鄙

圖 5，大鍋煮飯，中國士兵圍著鍋子，或站、或蹲、或跪，手端著大碗囫圇吞棗，吃相難看。同時，身上的軍服破爛，赤足，臉部表情猙獰，似是餓鬼，而後方的帳篷補丁，實在很難令人將軍紀與之聯想在一起。而日本隨軍繪製的浮世繪中，正好有描繪日軍的同樣主題，1894 年 11 月 7 日《圖片報》所刊登的〈日軍在(朝鮮)牙山大捷後召開慶功宴〉(圖 6)，日軍著整齊合身軍服，雖席地或坐或臥，但儀容姿態均極為精神，所使用的器物及動態，井然有序，整體氛圍歡樂卻不失紀律。將二者放置比較，立見高下。



圖5：〈百撰百笑〉

資料來源：

http://big5.china.com/gate/big5/tuku.news.china.com/history/html/2007-05-25/2024162_087312027.htm，「組圖：日本漫畫中的『甲午戰爭』」，老照片圖庫，中華網，2015/2/14 檢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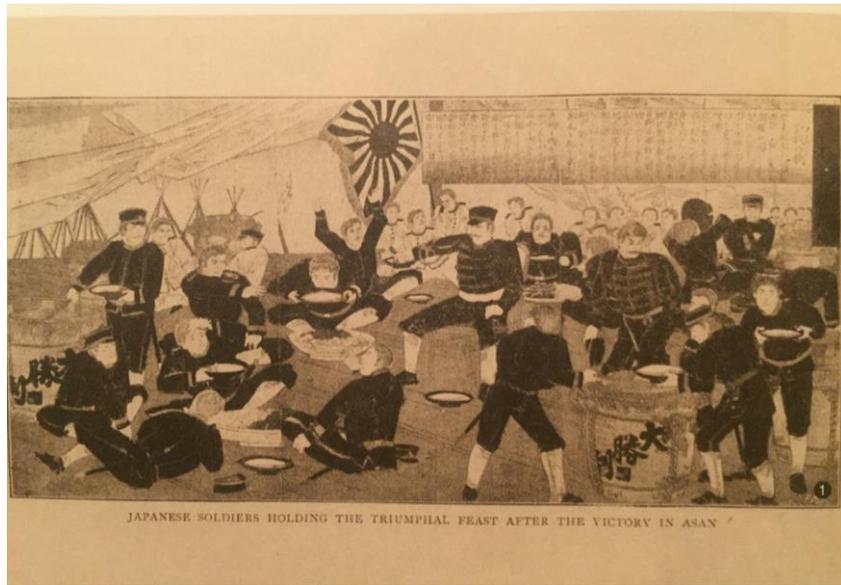


圖6：〈日軍在(朝鮮)牙山大捷後召開慶功宴〉

資料來源：萬國報館編著，《甲午：120年前西方媒體觀察》，頁188。

這一系列圖片，不論是主題還是人物形象，都清楚的顯示貶抑中國、提高日本形象的企圖。但如與當時他國的媒體展現比較，可以看出許多矛盾，其中尤以衣著外表最容易引起作用。

福澤諭吉(1835-1901)在其自傳中提及，1860年日本派遣使節團搭乘美國軍艦赴美辦理《日美修好通商條約》換文事宜，日本軍艦咸臨丸隨行。福澤因擔任日本軍官木村攝津守之助手，得以隨行，並在此行中獲得許多寶貴經驗。當時，福澤諭吉已屬日本少數通曉外國事物的專家，但一路之中，仍受到極大震撼，福澤諭吉敘述關於穿著的部分：

同船共有96人，大家平安順利抵達美國。船上接踵雜遝，船員雖穿著西式襯衫，腳上卻穿著草鞋。這次航行，大約儲備了幾千雙的草鞋。船上到處濕答答的，三十七天只有四、五天放晴，總之，船上一片混亂。抵達舊金山之後，艦長大施大捨，替每位船員買下一雙長筒馬靴，船員的穿著才像樣。¹⁸

¹⁸ 福澤諭吉著，楊永良譯，《福澤諭吉自傳》(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年)，頁129。

日人當時均穿著草鞋，腰間配帶兩支武士刀。當使節團抵達美國之後，美方招待一行人前往飯店下榻。福澤眼見地上鋪著地毯，大家都穿著鞋子行走其上，不禁目瞪口呆。猶豫再三，終究穿著草鞋走上去。¹⁹

1860年的日本使節團身穿和服，腳踏草鞋，腰間配帶兩支武士刀，大搖大擺地在巴黎、倫敦街頭漫步，就連福澤諭吉也自承「這身裝扮顯得極為怪異。」²⁰

李鴻章曾與日本外交官員森有禮(1847-1889)討論服裝之事。1876年1月，日本駐華使臣森有禮，與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鴻章會談，李鴻章表示日本氣象變化頗大，令人刮目相看。但李對日本盲目模仿西歐，改變服制一事，表示不同意見。森有禮認為日本自古以來，服飾寬大，僅適合無所事事者，對勤耕勞作之人完全不適。甚至表示：「這種服飾僅適合古舊時代，面對今日時勢之進步，便多有不便，所以日本必須改變舊式服裝，以洋服代之。人民自願改變，顯然利大於弊，對國家而言，更是益處良多。」²¹這種論調，幾近強辯。日本不可能立刻改變生產方式，自然也不會因此有改變服飾以加速生產之必要。至今，日人尚多保存傳統服飾者，遠較中國為甚。森有禮此種論調，僅能顯現日本在追求西化的過程之中，官僚階級是完全配合，並自我合理化。

但在西方人眼中，儘管日本試圖西化，卻未能得到西方人的認可，西方媒體對日本人服裝與穿著的形容，就不是這樣。西方漫畫中的甲午戰爭(圖7)，列強對於新加入「獵手俱樂部」的衣著不倫不類的日本觀望之餘還帶點不屑。圖中的日本人身材矮小，穿緊身西服，腳踏木屐，腋下夾著把黑傘，手拿大禮帽，長相尖嘴猴腮，姿勢彎腰駝背，與日本畫家筆下的日本形象截然不同。

顯示西方社會對日本的觀察及印象，努力穿著西式服裝，但仍不忘記其夾腳木屐，對比相當強烈。

¹⁹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自傳》，頁132。

²⁰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自傳》，頁146。

²¹ 宗澤亞，《清日戰爭》，頁287。



圖7：〈列強對於新加入獵手俱樂部的衣著不倫不類的日本觀望之於還帶點不屑〉

資料來源：

http://big5.china.com/gate/big5/tuku.news.china.com/history/html/2011-07-15/178675_1839273.htm，「組圖：西方漫畫中的甲午戰爭」，老照片圖庫，中華網，2015/2/14檢閱。

八、塑造日本遵循國際規則形象

美國《紐約世界報》隨軍記者克里曼(Creelman)在甲午戰爭期間，曾隨軍採訪，貼近觀察日本軍隊的移動與作為。他觀察報導：日軍部隊在行進中始終安靜，既不奏樂也沒有旌旗招展，顯示組織井然，軍勢威嚴。克里曼對日軍上上下下的愛國精神，印象深刻，認為日軍不僅武器可以與歐洲諸國比肩，野戰醫療體系，也極為先進，負傷士兵可以即時獲得治療，士兵也受基本急救訓練，能夠實施前期治療，以備轉送醫院。克里曼甚至認為，日軍可以與其學習的模範德國軍隊對抗，想必也能是棋逢對手。²²

這種在外國記者面前表現的行為，也令一位英國觀察家印象深刻。伊絲貝拉為英國遊記作家，中日戰爭期間，正在東北旅行，她眼見中國軍隊通過中國邊境，開赴朝鮮時，在奉天附近搶奪民家。還記載了清軍散兵游勇半夜闖入旅店，非但住宿不願付錢，還起意搶奪，將店內物品弄得狼籍

²² 宗澤亞，《清日戰爭》，頁256-257。

不堪，才揚長而去。她又見證日軍進入東北時，紀律森嚴，毫無倨傲行為，令旁觀者肅然起敬。²³

法國記者卡雷斯考和拉露記載日軍在山東榮成的登陸作戰，當隨軍記者上陸時，日軍已經展開安民行動，佈告中國居民不要驚慌，日軍絕不騷擾民眾。日軍甚至給予中國俘虜醫療救助與人道安置。相對於日本的文明舉動，中國軍隊就顯得殘酷，將日本俘虜斬首、斷肢，還有切睪丸之舉，無疑的相當野蠻。²⁴

但這種在國際媒體前刻意塑造的形象，無法掩蓋其在他處表現的殘暴。圖 8 的浮世繪刻意彰顯日軍在旅順的勇敢，要將「暴行清兵」斬首，以洩其憤。只見一排排清兵俘虜跪伏地面，手無寸鐵。在這種情況下，日軍何威武之有？這幅畫也非日本畫師憑空想像而來，1895 年 2 月 2 日，歐美各國轉載《圖片報》隨軍記者所拍攝的一幅相片，報導〈旅順的陷落，光榮的軍隊進城〉(The Fall of Port Arthur: the Entry of the Victorious Army, 圖 9)。圖中顯示日軍登陸旅順之後，殺戮許多清軍，並沒有先前所說的給予中國俘虜醫療救助的情況。除了日本繪製的浮世繪外，西方的攝影、繪畫均有類似主題與構圖的圖像記錄。1895 年出版的英文圖書《日清戰爭》中所附的插圖(圖 10)，日本士兵正在肢解中國人的屍體，這對待俘虜的方式，正呼應了克里曼在旅順大屠殺時的觀察。而這些圖像亦成為當時媒體有關日軍佔領旅順後暴行報導的有力佐證。

²³ 宗澤亞，《清日戰爭》，頁 258。

²⁴ 宗澤亞，《清日戰爭》，頁 257。



圖8：〈暴行清兵斬首之圖〉

資料來源：

http://big5.china.com/gate/big5/tuku.news.china.com/history/html/2006-12-30/2572476_456731675.htm，「日隨軍畫家筆下的甲午戰爭」，老照片圖庫，中華網，2015/2/14檢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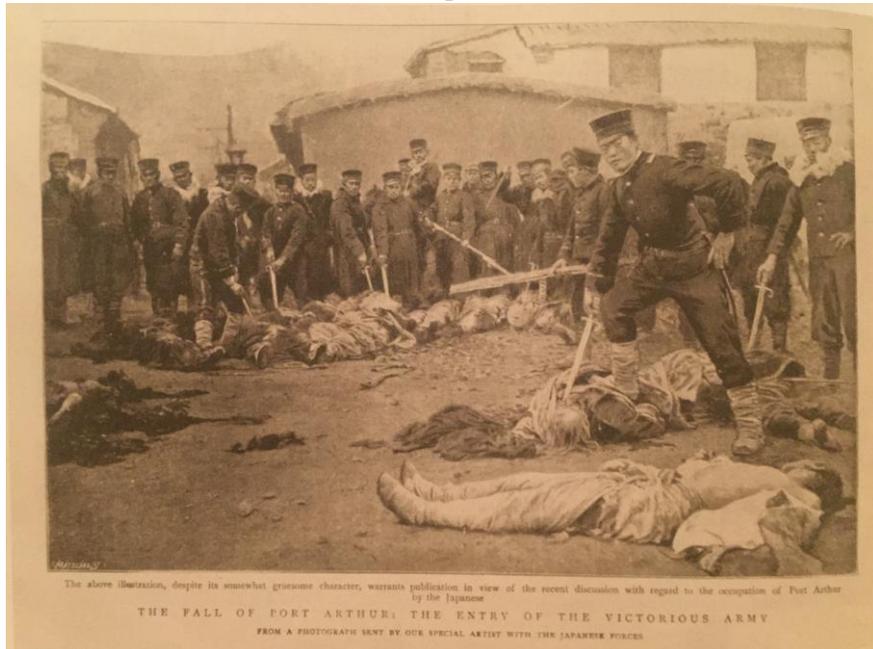


圖9：〈旅順的陷落，光榮的軍隊進城〉

資料來源：萬國報館編著，《甲午：120年前西方媒體觀察》，頁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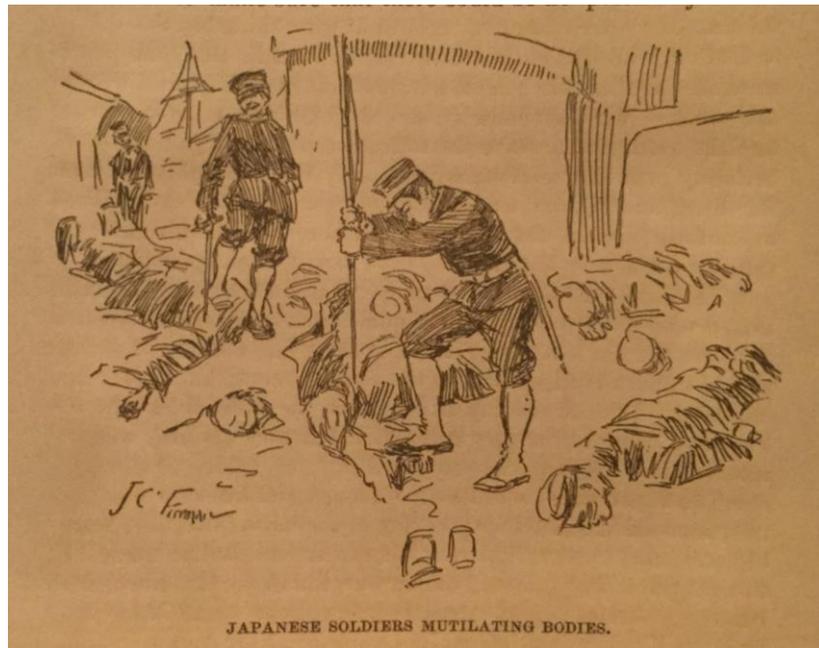


圖10：〈日本士兵正在肢解中國人屍體〉

說明：英文圖書《日清戰爭》插圖，1895年出版。

資料來源：萬國報館編著，《甲午：120年前西方媒體觀察》，頁219。

1894年12月日本《郵便報知新聞》報導：(11月)21日，旅順市街的巷戰仍在進行，炮聲槍聲如雷貫耳，屍橫遍地，慘如地獄。²⁵克里曼在《紐約世界報》上也曾報導：日軍於1894年攻陷旅順後，曾在城內搶劫4天3夜，屠殺百姓、強姦婦女，死難者約2萬人，只有埋屍的36人倖免於難。《倫敦新聞畫報》亦指出，日軍進入旅順後，大肆洗劫，街頭屍骸遍佈，景象淒慘。²⁶

日軍蹂躪在屍體上，以勝利者的姿態擺弄姿勢，神情一派輕鬆，視人命為草芥，引起西方極大的關注和討論。《紐約世界報》更進一步為文抨擊，日本是披著文明的皮而帶有野蠻筋骨的怪獸，日本今已摘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出野蠻的真面目。²⁷

²⁵ 轉引自萬國報館編著，《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體觀察》，頁222。

²⁶ 萬國報館編著，《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體觀察》，頁216。

²⁷ 1894年12月20日《紐約世界報》克里曼寫道：「日本為了朝鮮的解放，採取突如其

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刻意在戰場上善意對待敵方俘虜，但實際上在日本國內，任意殺人的事件，卻是時有所聞，對生命、人權並未尊重。1860年3月的櫻田門事變即為一例。日本「幕末」時期，尊王攘夷氣氛濃厚，對與外國人友善的官員，也列於殺無赦之屬。1860年3月24日(安政七年三月三日)，居於江戶的大名援例進城謁拜，水戶藩浪士不滿幕府大老兼彥根藩藩主井伊直弼(1815-1860)，²⁸遂組成暗殺集團，²⁹於江戶城櫻田門(今東京都千代田區的警視廳正對面)突襲井伊直弼隊伍，將井伊直弼首級砍下示眾。這種情況，克里曼報導指出的：「我親眼看見旅順難民並未抗擊犯軍」；「見一人跪在兵前，叩頭求命。兵一手以槍尾刀插入其頭於地，一手以劍斬斷其首。」³⁰並沒有差別，1862年生麥村事件也是同樣的場景。

1862年9月14日，英國商人查理斯·理察遜(Charles Richardson)、克拉克(Clark)以及一對住在香港的英國商人馬歇爾(Marshall)夫妻根據英日條約，進入日本，在東海道上行走，抵達達生麥村(現橫濱市鶴見區)附近時，遭遇薩摩藩藩主的監護人島津久光(1817-1887)和他的700人儀仗隊。島津原欲向幕府傳達朝廷攘夷旨意，浩蕩的隊伍佔據整條道路。根據日本習俗，平民遇到大名儀仗隊，必須下跪、退讓，但這四名英國人無意如此，被視為對大名不敬。島津衛隊拔出配刀，砍傷查理斯，其他人員蜂擁而上，將之砍殺致死他，克拉克和馬歇爾也受重傷，是為生麥事件。七百多名武士對付四名英國人的手段，無論如何算不上文明。在尊王攘夷論高張時期，薩摩藩卻可以將之解釋為「外國人蔑視日本人。」

福澤諭吉在其自傳中也討論了明治初年的日本情況：

仙台武士一聽到敕使要來仙台，眾人急著表現，竟然將七個首級獻給久我，久我嚇得說不出話來。當時有人向松倉與大童兩人通風報

來的介入進而變成野蠻的戰爭。事情的性質已經不是文明與野蠻間的糾葛，日本終於揭開自身的假面具，在最後的四日裏，征服軍的足下徹底蹂躪了文明。」萬國報館編著，《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體觀察》，頁215。

²⁸ 井伊直弼因得知英法聯軍攻下天津，乃於1858年六月違敕簽《美日通商條約》，又整肅異己，打壓反對派人士，引發殺機。

²⁹ 計有水戶浪士17人、薩摩浪士1人，合稱「櫻田十八士」。

³⁰ 美國《紐約世界報》記者克里曼於旅順屠殺事件發生後第四天(1894年11月24日)通訊報導。萬國報館編著，《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體觀察》，頁214-215。

信，他們從後門逃走，逃至東京。不用說，他們兩人的首級是在獵捕名單裏的。³¹

以上就福澤諭吉的記述，顯示當時日本社會動亂不安，隨意殺人這樣不文明的行為普遍存在，不可能在短短數年之間，有重大改變。日本在甲午戰爭期間，亟欲表現其文明的一面，但殘暴、不文明的部分在戰場上仍是可見，尤其是戰場上的屠殺，最具代表性的兩個例子，即是豐島海戰與旅順口大屠殺。這也說明數十年之後，南京大屠殺事件當中，日本軍隊在集體行動中，不斷重演其暴行。但此次戰爭行動中，日本為達其國際宣傳目的，刻意塑造文明形象，與事實似有相當距離。不過日本的宣傳，確實收到短期的效果。

九、日本國際宣傳之成效

戰爭爆發之初，歐美報紙廣泛報導了戰爭的新聞，而且多採取日本的立場，例如紐約《先驅報》說：日本如果在朝鮮勝利，將有利於整個世界；日本一旦失敗，朝鮮又得回到中國野蠻統治的情況。亞特蘭大《先進報》也評論：美國公眾毫無疑問地同情日本，認為日本代表著亞洲的光榮與進步。當時美國群眾甚至稱日本為「東方美國佬」，願意認同日本。³²對許多有關日本的負面報導，也不深究。日本媒體不斷向列強標榜明治維新的成效，認為日軍努力模仿歐美，遵守文明的戰爭規則，得到西方各國輿論的認同。日本並以第二軍司令官大山巖(1842-1916)為例，舉證其在大連灣作戰前，通告全軍，嚴厲禁止一切暴行和掠奪行為，必須保護佔領地人民。

但英國報刊已經出現日軍虐殺中國百姓的報導：1895年1月13日，李鴻章電告總理衙門，表示接到倫敦來電，表示英國泰晤士報刊報導：日本攻取旅順時，槍斃百姓四日，非理性殺戮，甚為慘傷。又有中兵數群被其執縛，先用洋槍擊死，然後用刀肢解。³³這與圖8浮世繪的圖畫一致，也與

³¹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自傳》，頁263。

³² 萬國報館編著，《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體觀察》，頁2。

³³ 萬國報館編著，《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體觀察》，頁215。

前述克里曼等人有關旅順大屠殺的報導相符。此事雖引起英美國家的震驚與關切，但日本利用各種手段，除了為自己辯護外，也另外發表「真相報導」，並攻擊克里曼等人。此事遂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稍後便如船過水無痕。

日本仍然一再宣傳：朝鮮戰鬥部隊出現給養困難時，軍中沒有發生掠奪強搶事件。滿州的大風雪裏，將士在「雪中進軍」曲的軍歌中忍耐著飢寒。圖 11 正是這種精神的表現。

圖 11 亦足以說明日本媒體所刊登的當時小林清親及其他隨軍畫家繪製的圖像能夠充分利用圖像的各種重要元素，傳達戰事乃至相關場景的重要概念。包括陸戰與海戰戰場與談判的場合。日本既然在戰事中獲得勝利，自然應當強調，畫面中不只呈現戰勝的部分，日本強調日軍的基本形象至少包括幾個重要元素：一、軍人形象：穿著合身西式軍服、靴子、短髮、規格配備一致的隨身攜帶物；二、行為舉止，背脊挺直、抬頭挺胸；三、表現軍人氣概的常見姿勢，包括舉槍、奮勇殺敵；四、臉部構成接近西方面部特徵，包括絡腮鬍、臉形等，另有傳統日本浮世繪對人物的繪製方式；五、圖像力求展現日軍整齊、訓練有素的軍容。



圖 11：〈我軍佔領劉公島之圖〉

資料來源：

<http://c-photo.i-part.com.tw/n1v1/1/6/3/6/1986361/photo/book21/13766192796549.jpg>，
2015/2/14檢閱。

但在日本的各種畫像中，出現的清軍也有一定的刻板形象，包括：一、

軍人形象：穿著寬鬆袍、布鞋、雜髮，拖著長辮；二、行為舉止可笑，有彎腰駝背者、多數缺乏自信；三、常見姿勢，包括被打趴在地、狼狽奔跑、可笑怪異；四、臉部表情猙獰、痛苦、醜怪；五、更有甚者，清軍軍容從未能整潔，多半處於潰逃狀態，軍紀散亂、士卒奔跑、逃竄，恆久處於挨打狀態。

不過當要對比出日軍的威武時，偶爾也讓中國軍官騎馬、用刀，以襯托符合日軍形象的場景，見圖 12：



圖 12：〈鳳凰城日清大激戰之圖〉

資料來源：

http://tuku.news.china.com/history/html/2006-12-30/2572476_456636646.htm，2015/2/14檢閱。

日本對兩軍交戰時的圖像描繪，常是一面倒的，日本大勝，中國敗逃，似是中國在各方面均遠不如日本，而日後在討論甲午戰爭時，也落入這個窠臼，認為中國的洋務運動失敗。但事實上，1894 年甲午戰爭爆發前夕，列強在遠東的相關人員比較兩國軍事規模，一致認為中國可以戰勝日本。當時隨軍的外國武官與記者的記載，也肯定中國的軍備與訓練，認為在當時是極為先進的。中國軍隊中有英、德兩國軍事顧問，中國軍官如劉步蟾 (1852-1895) 自福州船政學堂畢業後，曾在英國留學，並在英國皇家海軍地中海艦隊旗艦實習，任見習大副。回國後，先任北洋水師鎮北號管帶，經驗豐富，也是政府選拔的優秀人才。其他軍官、艦長也多有歐洲軍校學習經驗，無論航海、戰法之應用，都沿襲歐洲國家的作戰準則。英國評論黃海

海戰時就認為「定遠」、「鎮遠」兩艦在戰鬥中表現優異，裝甲防護能承受日艦炮彈的猛烈攻擊。此番海戰使用的近代戰艦在海上角鬥，雙方戰艦都表現出優秀的性能。日本海軍儘管獲得勝利，卻也不是如此輕鬆，也付出慘痛代價。

這種細部差異，在簡單的線條與快速瀏覽的新聞媒體中，根本無法呈現。日本倒是在戰後會談中的各種細部關鍵，諸如方為、服裝、態度及動作與姿勢，都極費心描述。

（一）〈威海衛陷落北洋艦隊後〉

〈威海衛陷落北洋艦隊後〉（圖 13），中國、日本、西方人從排列方式、位置、衣著、姿勢，看出隱藏在其後的意圖。在甲板上，畫面右側的中國人與西方人對著左側的日本人打躬作揖，站在左側日本人背對觀者，俯看、接受行禮，地位高下立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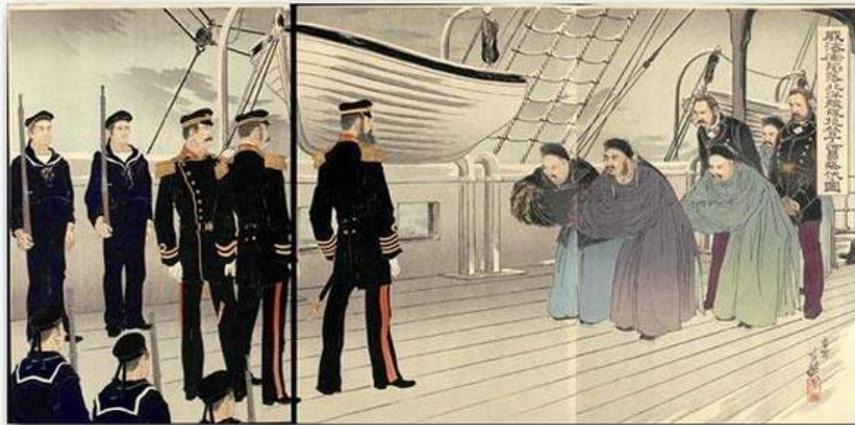


圖 13：〈威海衛陷落北洋艦隊後〉

資料來源：

http://big5.china.com/gate/big5/tuku.news.china.com/history/html/2006-12-30/2572476_456506397.htm，「日隨軍畫家筆下的甲午戰爭」，老照片圖庫，中華網，2015/2/14檢閱。

(二) 〈日清韓談判〉

〈日清韓談判〉(圖 14)，坐位配置，朝鮮居中、中國居左、日本居右。朝鮮與中國的坐姿、手的動作，中國人的腳抬起，顯示驚訝與不可思議，視線向上仰望日人，地位尊卑立現，非居於對等地位。桌上攤開文件，日人採取居高臨下俯看，顯示權力與掌握。穿著部分，中國人穿著似非朝服，過於輕簡隨意，色調紫、綠；反觀中間的朝鮮官，頭戴帽身著正式朝服；而日人則著軍裝，手持軍刀，叉腰，由衣服紋飾、腰封、燕尾、留鬍子。

會談主題中，日本的形象，身著軍服，身材高大挺拔，而中國、朝鮮、西方的形象則是較為隨便，不若日本的嚴謹。同時透過位置的安排，將日本塑造成掌控全域，優於其他國家。



圖 14：〈日清韓談判之圖〉

資料來源：

http://big5.china.com/gate/big5/tuku.news.china.com/history/html/2007-02-09/2555635_992194151.htm，「組圖：日本圖繪的甲午戰爭」，老照片圖庫，中華網，2015/2/14檢閱。

日本也在宣戰詔書上大做文章，指出大清帝國的宣戰詔書強調：朝鮮為大清藩屬，歲修職貢，中外共知。該國時多內亂，朝廷疊次派兵前往戡定，並派員駐紮該國都城，隨時保護。因朝鮮又有土匪變亂，國王請兵援剿，諭令李鴻章撥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倭人無故派兵，突入漢城，嗣又增兵萬餘，迫令朝鮮更改國政，種種要脅，難以理喻。

但是日本的宣戰詔書表現出全然不同的意象，指出：清國每稱朝鮮為

屬邦，干涉其內政。于其內亂，藉口於拯救屬邦，而出兵於朝鮮。朕依明治十五年條約，出兵備變，更使朝鮮永免禍亂，得保將來治安，欲以維持東洋全域之平和。日本這樣宣傳，對不明就裡者，日本天皇之詔書更能符合當時的國際主流概念，因此易於接受日本立場。所以日本宣戰詔書在國際傳播間，發揮極大功用。

十、日本的文明表象之後

當日本全盤西化，亟欲與歐美國家並立時，許多方面日本迎頭趕上，但不可否認的，仍保有原來的文化，而這樣的文化與西方接觸時，又會有什麼的結果呢？福澤諭吉在自傳中的記載中便提及其赴美的見聞，反映出日本當時的現狀，觀念行為種種皆顯示日本依舊是傳統的思維，即便在改變的過程，仍不可免的保有日本舊有的傳統。雖無法以落後二字形容，但與其口中的歐美文明是大不同的。

日本亟欲將自己塑造成文明國家，並以亞洲「傳統價值」為羞，特將其概念中「陳腐、守舊」之中國與朝鮮歸為一類，認為中韓不僅對日本毫無幫助，更因其落後腐敗，不願與之同列，擔心西洋人誤認為日本也是同樣的落後腐敗。因此福澤諭吉與加藤弘之(1836-1916)、西周(1829-1897)等人於明治六年(1873)創辦「明六社」，發行《明六雜誌》，宣揚西方事務，甚至教導人民如何穿著西裝、使用西式餐具，過西式生活。進一步主張日本應當拒絕與中國和朝鮮這兩個不文明的國家為伍，甚至應當脫離亞洲，加入歐洲。「脫亞入歐」論調，自然隱藏著訪問西方國家時所遭遇的種種挫折。

福澤諭吉敘述：使節團高層中，有一位人物在西方上廁所時，命其部下拿著紙燈陪同。該官員將廁所的兩層門都全打開，部下旁若無人地在廁所外面拿著其主人的褲裙及內褲等候，官員則在廁所裏以日本人的方式如廁。但廁所位於走廊之側，為飯店公共通道，男女往來，廁所內外則燈火通明。福澤經過該地，眼見此情景，嚇得說不出話來，立刻站在門外，以身體阻擋別人的視線，並將門關上，告訴官員之部屬，應當注意禮節。³⁴

³⁴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自傳》，頁147。

福澤諭吉「脫亞入歐」的想法的出發點，也就是《明六雜誌》標榜的重要內容，要改變日本人的世界觀、改變日本人的「國民風氣」，要發動日本的啟蒙運動，甚至開始攻擊日本的妻妾制度，要提倡符合西方價值觀的「一夫一妻制度」，也主張放棄中國的漢字，仿效西方拼音文字，利用假名拼寫日語。1884年，進一步成立「羅馬字會」，主張完全使用羅馬字母拼寫。由此也可看出日本對「文明」的態度。

十一、結論

中日甲午之戰，不僅是日本近代國家發展的重要時刻，也是中國近代轉型過程的關鍵時刻。不幸的是，清廷出於政治考慮，不願放手一戰，使原本並無勝算的日本能夠成為戰勝國，獲取大量賠償，發展軍事，更趁機佔領臺灣，突破其封鎖狀態，將吉田松陰(1830-1859)以來日本訴求的「帝國生命線」推展到臺灣；日本更強化其信心，而有1904年的對俄決戰，躋身東亞，乃至世界強權之列。日本自然視甲午戰爭為其「文明」指標之戰，更欲藉此凸顯其與中國的文明差距。自此之後，日本奮力追隨西方，朝著西方列強設定的「文明規範」發展，從衣、食、住、行、教育，一直到政治、經濟乃至社會組織，從具體實物到典章律令，一體遵守。

戰爭期間，日本製造了大量的圖像，其目的在於透過圖像進行觀念的建立，期望觀者由他們所觀看到的圖像引發對這一社會群體的想像和記憶。

這些日本隨軍畫家多用水彩畫，師法西方畫作，精密的表現手法，繪製方式較自由，人物靈活度高，線條不明確，可快速作畫，不需細細打底勾勒輪廓，對西方人而言，是熟悉的，較易接受，趨近於寫實的表現手法，尤其日軍站立舉槍的姿勢，幾乎是西方畫作的重現。另有木刻宣傳畫，得以大量印製以利宣傳。

正如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所言：

存有者不再是在場者，而是在表像活動中才被對立地擺置的東西，亦即是對象。表像乃是挺進著、控制著的對象化。由此，表像把萬

物糾集於如此這般的對象統一體中。表像乃心靈活動。³⁵

同時，「圖像並不是指某個摹本，而是指我們在『我們對某物瞭如指掌』這個習語中可以聽出的東西。」³⁶圖像在透過「理論框架」的解讀之後，可以帶出強烈社會、歷史、政治、意識形態。藉由圖像，日本形塑了日本與中國。

再者，日本成功的運用了宣傳媒體作為輔助戰爭的武器，讓全世界相信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是為朝鮮爭取獨立解放的文明戰爭，使日軍成為發動正義戰爭的一方。更由於宣傳策略的運用得宜，讓日本幾次面臨危機，都能化險為夷，讓自己從加害者的角色，轉變成因不得不的理由才付諸行動，讓原本是受害者的中國，反倒未能獲得國際的同情與支持，不得不正視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宣傳，除了讓日本站在不敗之地，更影響著日後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位置。

中國內部因為政治的問題，革命黨人對清的評價，也因為甲午戰爭的結果而決定要推翻清的統治，但憑心而論，當時清的狀況，並非如同革命黨人或日本所描繪的糟糕，只因為各自的目的，藉由宣傳之力，將清描繪的不堪，始能遂其心，日本始能有出師之名，獲得國際國內支持；而革命黨人，始得以藉維新已不足，必得推翻滿清始得救中國。

海德格強調：

現代的基本進程乃是對作為圖像的世界的征服過程。這裏「圖像」一詞意味著：表像著的製造之構圖。在這種製造中，人為一種地位而鬥爭，力求他能在其中成為那種給予一切存有者以尺度和準繩的存有者。³⁷

亦即世界圖像並非意指一幅關於世界的圖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為圖像了。³⁸德勒茲也提到，「圖像是與感覺相關的可感形式；……感覺就是直接傳達的東西，它迴避講故事的迂迴和乏味。」³⁹由於甲午戰爭，日本所強調

³⁵ 海德格著，孫周興譯，《林中路》（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年），頁95。

³⁶ 海德格，《林中路》，頁76-77。

³⁷ 海德格，《林中路》，頁82。

³⁸ 海德格，《林中路》，頁78。

³⁹ 德勒茲著，陳永國譯，〈繪畫與感覺〉，收入陳永國主編，《視覺文化研究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226。

的正是「文明之戰」，所以在圖像中以日本與中國做為文明與落後的對照。透過日本隨軍畫家所繪製的大量圖像中的軍人形象、戰事、主題內容等方向呈現文明與落後的對比。

一如羅斯(Rose G.)所言，圖像「它們用視覺語言轉述世界。但轉述本身絕非毫無心計。影像從來就不是觀看世界的透明窗戶。」⁴⁰基本上，所有影像都是人為的創作。⁴¹日本種種醜化中國的圖像，目的在說服觀者，日本一定戰勝中國，期望獲得支持。

⁴⁰ Rose G.著，王國強譯，《視覺研究導論》(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頁7。

⁴¹ 約翰·柏杰著，戴行鉞譯，《藝術觀賞之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頁3。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期刊論文

德勒茲著，陳永國譯，〈繪畫與感覺〉，收入陳永國主編，《視覺文化研究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De le zi, zhu, Chen Yongguo, yi. "Hui hua yu gan jue," shou ru, Chen Yongguo, zhu bian, *Shi jue wen hua yan jiu du ben*, Beijing: Beijing da xue chu ban she, 2009.

(二) 專書

Rose G. 著，王國強譯，《視覺研究導論》，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

Rose G., zhu, Wang Guoqiang, yi. *Shi jue yan jiu dao lun*, Taipei: Qun xue chu ban she, 2006.

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輯，《孫文學說》，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1951。

Zhong yang dang shi shi liao bian zuan wei yuan hui, bian ji, *Sun Wen xue shuo*,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1951.

尼古拉斯·米爾佐夫著，倪偉譯，《視覺文化導論》，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Nigulasi Mierzuofu, zhu, Ni Wei, yi. *Shi jue wen hua dao lun*, Jiangsu: Jiangsu ren min chu ban she, 2006.

吳汝倫編，《李文忠公全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

Wu, Rulun, bian. *Li Wenzhong gong quan ji*, Taipei: Wen hai chu ban she, 1980.

宗澤亞，《清日戰爭》，香港：商務印書館，2012。

Zong, Zeya. *Qing ri zhan zheng*, Hong Kong: Shang wu yin shu guan, 2012.

彼得·伯克著，楊豫譯，《圖像證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Bide Boke, zhu, Yang Yu, yi. *Tu xiang zheng shi*, Beijing: Beijing da xue chu ban she, 2008.

約翰·柏杰著，戴行鉞譯，《藝術觀賞之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Yuehan Bojie, zhu, Dai Xingyue, yi. *Yi shu guan shang zhi dao*,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93.

海德格著，孫周興譯，《林中路》，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

Haidege, zhu, Sun Zhouxing, yi. *Lin zhong lu*, Taipei: Shi bao wen hua chu ban she, 1994.

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Qi, Qizhang. *Zou jin jia wu*, Tianjin: Tianjin gu ji chu ban she, 2006.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59。

Liang, Qichao. *Wu xu zheng bian ji*, Taipei: Taiwan zhong hua shu ju, 1959.

萬國報館編著，《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體觀察》，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Wan guo bao guan, bian zhu. *Jia wu: 120 nian qian de xi fang mei ti guan cha*, Beijing: Sheng huo, du shu, xin zhi san lian shu dian, 2014.

福澤諭吉著，楊永良譯，《福澤諭吉自傳》，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

Fuzeyuji, zhu, Yang Yongliang, yi. *Fuzeyuji zi chuan*, Taipei: Mai tian chu ban she, 2011.

龜井茲明著，高永學等譯，《血證——甲午戰爭親歷記》，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

Guijingziming, zhu, Gao Yongxue, deng yi. *Xie zheng: jia wu zhan zheng qin li ji*, Beijing: Zhong yang min zu da xue chu ban she, 1997.

(三) 網路資料

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見：<http://zh.wikisource.org/wiki/上清帝第二書> (2015/02/14檢閱)。

Kang, Youwei. "Shang qing di di er shu," jian: [http://zh.wikisource.org/wiki/shang qing di di er shu](http://zh.wikisource.org/wiki/shang_qing_di_di_er_shu) (2015/02/14jian yue).

Through the Iconic Ukiyo-e: Meiji Japan's Propaganda Effort in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Chung, Shu-huey

Associate Professor,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re are numerous discussions about the events of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Many have held the opinion that the Qing dynasty's catastrophic defeat was inevitable. However, if we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within China and its military composition at the time, we realize there was not a great disparity between the two combatants, contrary to many have expounded. Why the improbable failur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n? And why were discussions and discourses on the War often sided with Japan? The answer is media propaganda, which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warfare.

This thesis examines how the Meiji era government achieved its propaganda victories by using icons - Ukiyo-e - as a medium during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Through mass quantities of the manga styled Ukiyo-e, the depicted or reshaped images of China and Japan had left a strong imprint on people. Meiji Japan was able to justify its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as a war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retrogression." Furthermore,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China and Japan held toward media propaganda played a major influence on foreign opinions and impressions of the two combatants. This had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rogress of the War. By using materials: words and images from modern Japan and Western sources, this thesis presents the real and the "packaged" images of Meiji Japan; investigates the drawings of modern icons and media propaganda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War.

Keywords: icon, media panpaganda, manga, Ukiyo-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